



许有壬与元代北方学统的建构

刘成群 高云鹏

摘要:许有壬虽系北人,但生长于南方,深受南方文化环境的影响。“延祐开科”,许有壬成为首科及第者,因而对“延祐儒治”的指导者李孟充满景仰,同时也着手学习姚燧文章。在李孟、姚燧等人的引导下,许有壬不但对北方文脉有了深刻认知,同时还在促进北方文脉与理学的合流即建构北方学统层面起了一定的作用。许有壬虽然乐于推动南北文化的涵化,但他的北方儒学立场是十分明确的。

关键词:许有壬;文脉;学统;涵化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1)01-0116-07

许有壬(1286—1364),字可用,彰德汤阴人。延祐二年(1315年)进士及第,历任参知政事、中书左丞等职,自元仁宗至元顺帝,“历事七朝,垂五十年”^{[1]4203},在政治上有一定建树。此外,许有壬还曾任奎章阁学士院侍书学士、翰林学士承旨、集贤大学士等职,在元代中后期的文坛也有一定的影响。目前学界对许有壬的生平及词作有一定的研究,但总体而言,还是存在诸多的不足之处,尤其是许有壬在当时儒学格局中所起到的作用,迄今还是较为苍白,我们在这里愿就这一角度抛砖引玉,以供学界商榷。

一、许有壬的出身与学术渊源

从籍贯上来说,许有壬属于北人无疑,但从“曾高以上,金乱失谱”^{[2]211}这一情况来看,应该也不是什么名门世家。许有壬祖父许毅迁居汤阴,遂落籍焉,许有壬所谓“公始居相,实开我家”^{[3]311},即指此。许有壬父亲许熙载生于中统

二年(1261年),娶妻后,应该是得到仕宦于湖广行省的外舅的推荐而由吏入仕。最初任德庆路提控案牍,后调任永州、衡州,继而调任长沙税使及临江、抚州总管府照磨等。许有壬出生于南方,早年伴随着父亲仕宦辗转而度过。由此可见,许有壬从身份角度来看属于北人,但从生长环境来看,却又有非常明显的南方文化的特点。

许有壬自幼跟随在父亲身边,可以说父亲是他最重要的老师。欧阳玄为许熙载所撰神道碑称其“为儒则通,治吏不龙”^{[2]213}。许有壬曾回忆说:“先公在乡校时,获拜缙山杜先生,手录其诗,挟之游江南。有壬总角,尝受读焉。”^{[3]263}缙山杜先生即杜瑛,杜瑛“取友溪南诗老辛敬之、李钦止、杨紫阳”^{[4]381},也与元好问交好,是金源遗士无疑。有学者研究许有壬,觉得“完全无学统可寻”,因而判断“其学得自家庭,而其父许熙载之学则不详所自”^{[5]25}。大体来说,许熙载之学取自北方的文化环境,杜瑛的影响不可忽

收稿日期:2020-11-0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元代北方文脉与儒学的演化”(20FZSB005)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成群,男,历史学博士,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北京 100876),主要从事元代文化研究。高云鹏,男,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讲师,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视。许有壬对这一学术线索念念不忘,后来为此写过《缙山书院记》《杜缙山画像赞》《墨灶山次杜缙山先生韵》一系列诗文。从这一点来说,许有壬身上是留存有北方学术基因的。

从许熙载碑文的描述来看,他的强项主要表现在吏治层面,如“料丁壮,输糗粮,高城深池,备御有法”^{[2]211}等皆可证明,因此“吏服其能,民怀其惠”^{[2]211}。作为北人,许熙载擅长吏事是有其历史渊源的。金末“贞祐南渡”后,统治者大力奖用胥吏,如金宣宗“奖用胥吏,抑士大夫”^{[6]73},丞相术虎高琪也“大恶进士,更用胥吏”^{[6]71},从而拉开了北人重视吏事的序幕。由于文化的惯性,元代北方的儒士普遍擅长钱谷、转输、期会、工作、计最、刑赏、伐阅、道里、名物,其价值观可以凝练地表述为:“儒术审权精吏事,仕途横槩张吾军。”^{[4]143}许熙载精通吏事,乃是北方文化环境使然。受父亲影响,许有壬为官也擅长此道,从捕盗、刑赏到赈饥、课税,皆有政声,非一般腐儒可比。

许有壬自出生起便一直生活在南方,所学带有明显的南方文化的印迹自是不难理解。许有壬幼年生活在武昌,见到的多是南方的文化人物,如其云:“予幼侨鄂,见掾于省者多俊伟士人,望而重之。”^{[3]324}后来随父亲辗转于永州、衡阳、湘潭间,大约在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拜李秋山为师,如其自述云:“有壬总角,师从庐陵李秋山先生,读书零陵。”^{[3]162}后转至衡阳郡学,“师兰野吴先生”,同时请益于陈翼卿先生。李秋山者,其生平史籍失载。兰野吴先生,即吴刚中,许有壬记载曰:“胜国咸淳甲戌湖南混试,终场万七千八百余人,取合格二十六人。先生试赋《天地大德曰生》,通榜第二,赋则魁也。”^{[3]322}陈翼卿系陈雍之父,也是一位曾经“有声屋场”^{[3]163}的隐君子。在元初时代,像李秋山、吴刚中、陈翼卿这样的故老应该不在少数,许有壬就称:“时混一才二十年,故老尚多,幸及从学,粗有得也。”^{[3]240}又云:“窃惟混一之初,故老具在……大德初,予读书江南,犹及见之。从问往事,历历可稽。”^{[3]321}

南宋末年理学迅速扩张的时代,“至晚宋朱学再传、三传时,朱学实已遍及南宋各地”^{[7]362}。许有壬所见到的那些南宋故老居多

受到过正规的理学教育,因此他们所讲所论,都与理学相关。许有壬自幼在湖广,得蒙故老的亲炙,他对理学理解得十分透彻,尤其是对朱熹、张栻等大儒充满景仰之情,如其赞美曰“朱张操大舟,涉海示我湄”^{[3]40},又云“朱张挹洙泗,一滴沾涖湘”^{[3]39},又云“太山未敢小天下,岁晚好继朱张盟”^{[3]67}。对于理学在北方的普及,许有壬欢欣鼓舞,如其云:“我元一文轨,然后程朱之学大明于世。”^{[3]175}又云:

理学至宋始明,宋季得朱子而大明。前辈言天限南北时,宋行人篋《四书》至金,一朝士得之,时出论说,闻者叹竦,谓其学问超诣,而是书实未睹也。文轨混一,始家有而人读之。科举行,以经术取人,诏首崇用,又人人治之矣。^{[3]171}

许有壬自幼身处南方文化环境里,濡染其中,因此并不像纯粹的北方儒士那样执意以金源为正统。且不说郝经著《立政议》、王恽著《请论定德运状》了,即便姚燧的《国统离合表序》也表现出批评朱熹《资治通鉴纲目》而回护金源的意味。但许有壬对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就十分肯定,如其曰:

朱子感兴诗,躡举三朝而不他及,其有激于欧、马,而纲目之所以作也。……朱子慨然本《春秋》之旨,任笔削之重,主正统以明君臣之分,严书法以诛乱贼之心,其取义大矣。^{[3]159}

肯定了朱熹《资治通鉴纲目》的正统之说,当然就意味着并不特别回护金源。在许有壬的文章里,也常常可以看到这一倾向,如其云:“中原自宋播浙,文教几熄,金源氏分裂之余,设科取士,士气奄奄仅属,而吾乡登第者余五十人。”^{[3]167}虽谓赞赏金源氏设科取士,但又称“士气奄奄”。又《文丞相传序》云:“宋养士三百年,得人之盛,轶汉唐而过之远矣。”^{[3]159}从“宋养士三百年”一语可见,许有壬是主张南宋承北宋之统的。

许有壬虽为北人,但生于南方长于南方,这一经历使得他与纯粹的北方儒士有了很明显的区别。像许有壬的好友苏天爵,就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北方儒士,从苏天爵编撰的《元朝名臣事略》和《元文类》来看,很明显是由金至元的北

方学统张目。当然许有壬也不同于成年后才游宦江南的北人,如元明善弱冠才游吴中,以文章名于江南。但元明善这种半路出家的人很难完全认同南方的文化,他在江西、金陵时,“每与虞集剧论,以相切劘”,尤其是批评虞集“治诸经,惟朱子所定者耳,自汉以来先儒所尝尽心者,考之殊未博”^{[1]4173}。就明显体现出北方经学的立场。所以说,元代北方儒士对南方文化的看法,苏天爵是一个类型,元明善是一个类型,而许有壬可以算得是一个不同于前两者的类型。

二、“延祐开科”与许有壬对北方文脉的认知

大约在大德十年(1306年),许有壬来到大都求仕。《元史·许有壬传》有记载云:“年二十,畅师文荐入翰林,不报。”^{[1]4199}由是而陷入了困顿,乃至“落魄京华”^{[3]323},至大二年(1309年)的时候,许有壬才得到了一个开宁路学正的职位。皇庆元年(1312年),许有壬任山北廉访司书吏,从事刑狱、赋税等吏事。可见,许有壬北上后很长的一个时期都是在底层慢慢爬坡。直到科举的推行,给许有壬带来了翻身的机遇。

皇庆二年(1313年),元仁宗宣诏科举取士,于次年推行,因次年改元“延祐”,史称“延祐开科”。许有壬参加乡试、会试、廷试等一系列程序后,杀出重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廷试策问》乃翰林侍讲学士元明善所出,许有壬的试卷还得到了元明善的亲笔批点,所谓“张起岩、许有壬二卷则翰林侍讲学士谥文敏元明善笔也”^{[8]520}。不但如此,许有壬还得蒙李孟、赵世延和赵孟頫三位巨擘的接见与勉励:

知贡举乃读卷平章政事臣李孟,读卷参知政事臣赵世延,集贤学士臣赵孟頫皆坐,礼方洽,呼臣有壬前,平章指参政而语有壬曰:“始子策第,高下未定,参政言:‘观此策必能官,请置第二甲。’吾不许,置上复掇下者至于再三。”又指集贤曰:“学士见吾辈辩不已,乃立请曰:‘宋东南一隅,每取尚数百人,国家疆宇如是,首科正七品取多一人,不多也。’乃从之。吾谓此卷何人,而使吾数老人争论终日,拆名后当观其面目。

吾非市恩掠美也,使子知其难耳,子其勉之。”^{[3]327}

李孟身为中书宰执,位高权重,却能对许有壬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后辈坦露心曲,这对许有壬的精神激励可想而知。许有壬对于李孟一直保持一种非常的尊敬,如其《寿李秋谷平章》一诗云:“黄钟嘘暖挽春留,绿蚁浮香带月匀。宰相得闲才是贵,人生有子更何求?家传文字五千卷,身在神仙十二楼。记取年年好风景,雪松霜桧岂容秋?”^{[3]94}

作为“延祐开科”的直接受益者,许有壬对李孟的赞美首先是因其开始了科举。如《送冯照磨序》赞曰:

盖中原自金源氏灭,贡举废且百年,故延祐癸丑诏下,天下耸动,思见德化之盛,复限吏秩,广儒用,默寓消长之机焉。圣人之心,其至矣乎!亦惟秋谷李公恳恳于播越在渊时,一旦爰立,大议遂定。^{[3]167}

当然,议定科举只是李孟功绩的一个方面。李孟并非皓首穷经的腐儒,而是具有超强的政治才干,在成、武授受之际与武、仁交接之时都有非凡的表现。在以李孟为首的“怀孟集团”的积极筹划下,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绕过“忽里勒台”直接即位,这也就是张养浩所谓的“两定内难”^{[9]123}之功。对此,许有壬也有过描述:“大德之末,丁国势危疑,神器机隍之会,犹操舟滟滪三峡,遇排山倒海之风,而能力赞秘策,卒底平济,非社稷之臣乎!”^{[3]182}

元仁宗即位后,李孟为中书宰执,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其核心乃是采取儒治,推行汉法,同时“协助爱育黎拔力八达完成了强化君权的基本工作”^{[10]167}。从宏观的角度来说,许有壬更是因为李孟开启了“延祐儒治”而对其产生了高山仰止之情,又如其赞美曰:

名爵扫地而削其尤,锡予空帑而复其旧,大官恃不钩检而核其滥,宿卫依凭城社而汰其冗,贵近世臣莫敢议。及乃挺身任之,灼知将来之危而不恤也。国家用儒者为政,至元而后炳炳有立者,先生一人而已。^{[3]182}

据说在李孟早年,商挺、王博文等人都“折行辈与交”^{[1]4084}。商挺系元好问的友人,而王博文则

为元好问弟子。元好问承金源余绪,十分重视“文辞”与“治道”的合一。在元初的元门弟子那里,倡导“文辞”与“治道”合一的,不唯王博文,其他如王恽、胡祗遹、魏初、阎复等皆是,从而形成了一个儒学群体,并延续为北方文脉。受环境濡染,李孟身上的金源元素是十分明显的,如崇尚“治道”,尤其是“善论古今治乱”^{[1]4084}。同时李孟也有一定的文辞才能,《元史》记载李孟“为文有奇气”^{[1]4090}。许有壬不但非常认可李孟的“治道”才干,对于其文辞能力也是不吝赞美,如云:“才气跌宕,落笔纵横,歌诗流播,荒陬下邑,传邮逆旅,往往大书于壁。然世歌诗而不知其文,知其文而墓碑未出,不知其功勋之大之详也。”^{[3]182}李孟身上“文辞”与“治道”并重的取向,对于承受其恩泽的后生小子来说,具有一种导向作用。考察许有壬所作的《秋谷文集序》,其中所讲论的,也无外乎“文辞”与“治道”两个层面。许有壬“文道合一”的主张,即便不是自此而开启,也会由此而加强。

李孟毕竟是一位政治家,据说“常自毁其稿,家无几存”^{[1]4090},这使得他在文坛的影响力大大缩减。在整个元代,真正倡导“文道合一”且在文坛发挥出巨大影响的人物乃是姚燧。姚燧系许衡弟子,属于理学阵营的人物,但姚燧却与乃师“文章之为害,害于道”^{[11]72}的认识不同,而是受到杨奂、元好问等人影响,提出“文章以道轻重,道以文章轻重”^{[12]69},保存了金源儒学的某种元素,成为北方文脉的关键环节。许有壬北上大都,得到了畅师文的推荐。畅师文与姚燧、高凝皆为许衡高弟,他们之间“相推友善”^{[3]237}。至大元年(1308年)又与贯云石结识^①。贯云石此时正从姚燧学^②。因为畅师文、贯云石的关系,许有壬或有拜谒姚燧的机会。

且不管有无拜谒过姚燧,许有壬对姚燧诗文是熟知的,如称“牧庵老仙善游戏,赠诗专咏君姓字”^{[3]56}、《二题贾氏白云楼次牧庵韵》皆可证明。当然,许有壬也对姚燧推崇备至,称赞其曰“昔我牧庵先生,实主文衡”^{[3]182},又曰“至大间先生之侄牧庵为翰林承旨,实握文柄”^{[13]620}。姚燧在元代以学习韩愈而著称,许有壬也表现出了这样的特点。孙克宽就曾指出:“文势颇善掉弄,大约是从昌黎文境出来。他善为典重之文,

造句下字,均似韩法。元代北方古文大家姚燧,其文势学昌黎,许氏或受其熏陶。”^{[14]424}在许有壬文集里可以检索出提及韩愈的文句20余处,亦可为证。

金末的儒学重估思潮,其性质类似于唐宋时代的古文运动,此思潮经由元好问延续至姚燧“文章以道轻重,道以文章轻重”,形成北方共同认同的文脉观念。许有壬北上大都,经过“延祐儒治”的淬炼,尤其是在李孟与姚燧那里得到了观念上的熏陶,对文章以及文章之士有了充分的认识,即便是对苏轼,也是要从古文运动的角度尝试理解,谓之“文章在天地间”,并与韩愈相比并:

窃尝妄意公作韩文公碑,盖亦以自道也。其言所能者天,所不能者人,则文公之迹与公又大有相类者。然文公自潮阳归,不出朝廷而卒于家,公则间关万死而幸得归,席尚未暖而病遂不起,此则又有甚于文公焉。而其昌于天下,信于后世者,则二公等也。^{[3]184}

在倡明韩愈、欧阳修等人古文意义的同时,许有壬也进一步明确了对“文以明道”的认知,体现出向北方文化环境靠拢的姿态。如其云:“夫文以明道而假乎辞也,文而不至,道将焉传?”^{[3]169}又《题欧阳文忠公告》一文曰:

文与道一,而天下之治盛。文与道二,而天下之教衰。经籍而下,士之立言力非不勤也,辞非不工也,施之于用,卒害其政者,与道二焉耳。昔苏子以韩愈配孟子,而以欧阳子为韩愈,天下以为知言。后世不敢有异议者,韩也,欧阳也,推而达于孔子之道也。^{[3]320}

许有壬在科举及第之后,受到李孟、姚燧等北方巨擘的影响,真诚地相信北方的文脉——文道的合一。此外,许有壬还十分注重对北方文脉的回溯,他对金末儒学并不忽略,也曾有诗提及赵秉文^{[3]143}。相对而言,许有壬显然更加推崇元好问,其诗文多次提及元好问,尤其是多和其诗,如《游善应宿储祥宫次元裕之韵五首》,有如《记游》所称“登西楼和元裕之诗”^{[3]205};同时也时常题跋元好问遗墨,如《跋盍正甫所藏元裕之诸公手简》称赞“元公之学”^{[3]326},《题遗山乐府墨

迹》则曰：“银蟾淪魄景星微，闲杀天孙织锦机。回首蓬莱三万里，彩鸾犹傍五云飞。”^{[3]142}

元好问在金末倡导“文统”，接续金源，可以说是北方文脉的关键性人物。在其身边多有金源遗老，许有壬对他们也一并礼赞，如杜仁杰，许有壬就称赞其“杜公之达”，即便是王文统，许有壬也不回避，用“王公之才”进行肯定^{[3]326}。在元初翰林国史院引领一时风向的王磐，许有壬也多次用次韵的方式来表达敬意，如《黄华山次王鹿庵韵》《洪峪用鹿庵韵》等皆是。对于接续元好问“文统”之说的元门弟子，许有壬也多有关注，如《题张毅夫右司所藏捕鱼图用胡紫山韵二首》就是用的胡祗适的诗韵，《青崖魏忠肃公文集序》则是对魏初的肯定，所谓“其为文不徒文也，其有得于经术者乎”^{[3]175}。

元好问及元门弟子群体在元初影响甚大，他们推崇的“文统”之说甚至形成一条类似于学统的文脉体系。姚燧虽然系许衡弟子，但也备受这条文脉影响，成为一个关键性的人物，许有壬对姚燧“文章以道轻重，道以文章轻重”的说法是非常认同的。其他如卢挚、李术鲁翀、马祖常、宋本等北方儒士也大都受北方文脉影响，皆以文章名世。许有壬《游岳麓书院登风雩亭寻朱张遗躅用疎斋卢先生韵》则表明他对卢挚亦有一定研究；对于李术鲁翀，则盛赞其文章，如云：“弱冠名先振，高风士久歆。文章追古作，韶濩发遗音。”^{[3]88}对于马祖常，许有壬更是盛赞其文章，如云：“文章君瑞世，交友我忘年。典玺当机要，求人得俊贤。”^{[3]89}又赞云：“当年笔阵扫千军，要继先秦两汉文。”^{[3]114}又有《宋诚夫文集序》一文赞宋本云：“使读其文者知其政事之长，而信其见之文者。”^{[3]161}

三、南北文化涵化与许有壬的北方儒学立场

元代在疆域上实现了一统，但在制度与文化层面，南北长期存在着隔膜。家铉翁对当时南北文化隔膜状况有过描述：“迨夫宇县中分，南北异壤，而论道统之所自来，必曰宗于某；言文脉之所从出，必曰派于某”^{[15]509}。面对这一局面，至元年间南下的北方儒士和北上的南方儒

士开启了南北文化的破冰行程。当然，冰的融化需要一定的时间，文化上的涵化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即便到了“延祐儒治”的时代，南北文化隔膜的状况依然没有得到有效的改观。

在促进南北文化涵化这一方面，北上的儒士如赵孟頫、袁桷、邓文原、虞集等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们会着力向北人推介南方文化；而南下的儒士如卢挚、张之翰、元明善、马祖常等人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也会积极向南人灌输北方的文脉。当然从另一方面，他们的确也会自觉不自觉地接受对方的文化观念。“延祐儒治”属于元代南北文化涵化的快速发展期，而接下来的奎章阁学士院时期更是大力度地促进了南北文化涵化的进一步发展。

奎章阁学士院建立于天历二年（1329年），系元文宗与元明宗以及燕铁木儿家族进行政治博弈的产物，是元文宗时代重要的文化标志。在奎章阁中，除了鉴赏文物字画和进行文学创作外，还有供皇帝顾问的职能。奎章阁学士院人员构成是多元的，除了泰不华、阿荣、阿隣帖木儿、铁睦尔塔识、朵来、沙刺班、朵尔质班、康里巎巎、赵世延等蒙古、色目知识分子外，奎章阁也体现了北人与南人混搭的特点。如北人有宋本、王守诚、李洞、李讷、吴炳、苏天爵等，南人有虞集、欧阳玄、柯九思、揭傒斯、杨瑀等。许有壬与宋本、苏天爵等北人有深交，与虞集、欧阳玄、揭傒斯等南人亦十分相得。在许有壬的文集中可以看到相当多的与诸公的唱和之作，也可以说，许有壬是一位推动南北文化涵化的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

奎章阁学士院中，北人与南人相处融洽，这在促进南北文化涵化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在这一点上，许有壬也不例外。虽然许有壬乐于推动南北文化的涵化，但其文学立场却是站在北人这一方的，如欧阳玄从诗学角度评价云：“家本梁赵，流寓荆楚，筮仕并营，其诗盖负豪爽之资。”^{[2]284}此外，其所作词也体现出“作北风”的特点。《圭塘乐府》中的词作，或登临怀古、悲悯民生，“境界高远，有长枪大剑意度”^{[16]610}，如“酹酒中天，振衣千仞，尘世烟霞有几区”^{[3]350}；“鼓柁茫茫，万里棹歌，声响凝空碧”^{[3]355}。我们把许有壬视作北

人或南人都讲得通,但他的词的确有金元北宗词“豪放质朴的风格”,同时也具有金元北宗词“隐逸避世的思想倾向”^[17]。

如邱江宁指出,奎章阁学士们通过“南人作北风”“北人作南风”促进了文学层面的南北融合^{[18]3}。当然,北人可以作南风,在诗文上追求些新奇感,这一点并不稀奇。但从学统这一具有立场性的角度考察,几乎没有北方学者愿意放弃自己的主张而屈从于南人。在许有壬那里,我们明显可以看到这一特点。许有壬不但对北方文脉十分仰慕,同时也十分推崇许衡,甚至像李孟那样,热衷于将两者捏合起来,以之建构北方之学统。

元代北方儒学大约有两个主要体系,一为承袭金源儒学的儒学群体,侧重“文辞”与“治道”,形成北方文脉体系;一为赵复北上所传的理学,许衡为集大成者,侧重义理之说与躬行践履。虽然在元初的政治格局演变中,两种儒学也出现了互相涵化的迹象,然而彼此扞格还是明显存在的。李孟治学虽多带有金源儒学的特点,但在主导“儒治”时,许衡当年推行汉法的尝试就作为一种极好的政治资源推到了李孟面前,作为务实的政治家,李孟当然也不会摒弃。因此在“延祐儒治”期间,李孟对北方文脉与许衡理学进行了大力度的捏合,以之建构北方学统。从科举科目兼用程朱之说与古注疏的特点来看,其捏合的痕迹就十分明显。

姚燧作为许衡弟子,虽然热衷于文章之学,但对理学也是熟稔于心的。在这一点上,许有壬与其具有一致性。许有壬生长于南方,对理学极有情感,延祐中式后,受北方文化环境尤其是李孟的影响,逐渐将情感寄托移注到了朝廷所推崇的许衡身上,如其《鲁斋书院记》云:

天佑我元,俾道统之传,亟有所属,朱子卒才八年而先生生。际兴王之昌运,得正学之真传,接道统以淑来世,任斯道以觉斯民,非天意有属,而能然乎?举而措之事业,若《时务五事》其概也。呜呼!中统至元之盛,有隆古之所未及,而有志之士窃有感焉者,何哉?孟子距杨、墨,韩子谓功不在禹下。程子兴起斯文,其要在辨异端,辟邪说。先生之立朝也,当更始万物之际,正

始以理万事,端本以畅百支。则其时也,乃有申、韩邪说杂鹜于中,其言甘而易入,其功卑而易著,举世俛俛以为开物成务如斯而已。当时辞而辟之者,其有所自也。卒之正言以验,正道以明,使踵之者知其不容于正途,怨塞其将来,盖攘斥之功出于平居讲明圣学,辨别邪正之有素也,其有功于世大矣!世徒知道统之有在,而不知所以羽翼。夫道统者,又有在焉!^{[3]215}

对于许衡身边的理学家,许有壬也是极有尊敬之意,如关于姚枢,则赞颂曰:“雪斋姚先生,当世祖龙潜之时,首陈二帝三王之道,佐立万世无疆之基,所以阐明道学,其功大矣。”^{[3]621}又云:“九原可作,吾其从雪斋乎!”^{[3]326}

与李孟一样,许有壬也谋求于北方文脉与许衡理学的合一。对于元门弟子中受到理学涵化的弟子,他是拍手欢迎的,如对于魏初的文章,他就评价说:“我元一文轨,然后程朱之学大明于世,造诣深者蔚为名贤,推绪余为文章,亦莫不度越世习,盖理胜则文在其中矣,有壬于青崖魏忠肃公之文窃有见焉。”^{[3]175}对于苏天爵维护北方学统的《国朝名臣事略》一书,他也十分强调与理学的关联:

惟其培学上庠,历史属久,故考之也详,择之也审,其类例仿朱子《言行录》,条有征据,略而悉,丰而核,其四方之争先快睹者乎!窃惟国朝真才云集,是编才四十七人,有齐民知名而未录者,盖朱子例,嗣有所得,当续书之也。^{[3]160}

综上所述,许有壬对北方文脉与许衡理学的合流是持积极态度的,无论北方文脉还是许衡理学,都属于北方儒学体系。但从这一点,就可以明显看出许有壬的学术立场。

李孟“其论必主于理”^{[3]4090},又推崇许衡之说,但其捏合的北方学统明显是涵盖金源“文辞”与“治道”,因此与南方理学并不完全一致。李孟对南方泥于心性及泛滥训释的儒士并不满意,一个明显的证据是,他对南方儒士吴澄、程复心就有过一定的排斥。在整个元代,南方隐于乡间的理学士人很多,如金华、徽州、闽北、江右等地,都有颇有规模的理学群体前后承继,但考察他们的著述,以许衡为学统的并不多见,谈

及北方文脉的更是万中无一。有关学统的认知,在当时存在朝野或南北的不同判断。可以肯定的是,许有壬的北方学术立场与李孟是相吻合的。

在“延祐儒治”时代,许有壬甫入政界与文坛,还属于后生小子,到奎章阁时代及以后,许有壬历任奎章阁学士院侍书学士、参知政事、中书左丞、翰林学士承旨、集贤大学士等,开始将影响力全力发挥出来。在南北文化涵化的时代,许有壬虽然也参与其中,但认真考察则可以发现,他还是将砝码放在北方文脉那里,通过北方文脉进一步整合为北方学统。由此可见,在元代中后期,即便是发生了南北文化的涵化,但北方文脉及北方学统无疑是一种强势的文化,在相互涵化的过程中,明显占据了主导地位。

注释

①许有壬《木兰花慢》其二:“至大戊申八月廿五日,同疏仙万户游城南廉园,园甲京师。主人野云左丞未老休致,指清露堂扁,命予二人分赋长短句。予得清字,皆即席成章。喜甚,榜之堂上。疏仙其甥也,后更号酸斋云。”见许有壬:《木兰花慢》,《至正集》卷七十八,《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7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351页。②《元史·小云石海涯》记载:“北从姚燧学,燧见其古文峭厉有法及歌行古乐府慷慨激烈,大奇之。”见宋濂等:《元史》卷一百四十三,中华书局1976年

版,第3422页。

参考文献

- [1]宋濂等.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 [2]欧阳玄.欧阳玄集[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
- [3]许有壬.至正集[M]//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7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
- [4]胡祇适.胡祇适集[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
- [5]查洪德.理学背景下的元代文论与诗文[M].北京:中华书局,2005.
- [6]刘祁.归潜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7]何俊.南宋儒学建构[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 [8]宋褰.燕石集[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2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 [9]张养浩.张养浩集[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
- [10]傅光森.元朝中叶中央权力结构与政治生态[D].台湾中兴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2008.
- [11]许衡.许衡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9.
- [12]姚燧.姚燧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 [13]许有壬.圭塘小稿[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1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 [14]孙克宽.元代汉文化之活动[M].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68.
- [15]苏天爵.元文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
- [16]黄拔荆.中国词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 [17]赵维江.论金元词的北宗风范[J].文学遗产,2000(4):94-105.
- [18]邱江宁.奎章阁文人群体与元代中期的文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Xu Youre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orthern Academic Tradition in Yuan Dynasty

Liu Chengqun and Gao Yunpeng

Abstract: Xu Youren was born in the North, but he grew up in the South and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southern culture. After the resumption of imperial examinations during the Yanyou years, Xu Youren succeeded in the first examination, so he admired Li Meng, the director of the resumption of imperial examinations, and began to read Yao Sui's articles. With the guidance of the scholars like Li Meng and Yao Sui, Xu Youren not only had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northern heritage, but also played a role in promoting integration of northern heritage and Neo-Confucianism, i. e., constructing the northern academic tradition. Xu Youren was pleased to facilitate acculturation of North and South, but his position on northern Confucian thought was clear.

Key words: Xu Youren; heritage; academic tradition; acculturation

[责任编辑/周舟]